

濛溪河遗址的故事

郑喆轩

1951年,在自主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成渝铁路施工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古人类化石——资阳人头骨化石惊世出土,拉开了西南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序幕。

七十年后的2021年,一场洪水席卷了距离“资阳人”发现地仅35千米的濛溪河流域,沉睡数万年的濛溪河遗址被发现,并在后来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与“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然而回望这段发掘历程,濛溪河留给我的,不仅是令人惊喜的学术突破,更是一段充满挣扎、几经磨难的“痛苦”跋涉。

一双鞋换来与古人忽然之间的相遇

濛溪河的发现,恰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是新时代基层文化自觉的生动写照。

2021年9月,因洪水冲毁濛溪河上的五一水坝及沿岸,鸟木与动物化石随之暴露。这类遗存在洪水频发的华南地区并不罕见,大多与人类活动无关。然而当地村民却敏感地意识到该情况的潜在特殊性,拨打12345热线反映线索,信息经雁江区文管所所长王屹转到了我的手中。

尽管有一张照片中的石块疑似石器,但其余图像——特别是所有剖面的照片均显示土层纯净,初步判断极不可能是遗址。后来的发掘证实,这些区域确与古人类活动无关。当时正值稻城皮洛遗址首次发掘的关键阶段,我已连续加班多日,且后续已有许多紧急的工作安排。然而这毕竟是我入川后首次接到地方主动报送的且有一定可能性的旧石器线索,又恰逢“资阳人”发现70周年,犹豫之后,我仍于次日赶赴现场。

在河道中,我很快辨认出若干明确石器和动物化石,显示这一带确有古人类踪迹。然而它们从何而来?旧石器遗址通常分布于较高阶地,可我对周边潜在埋藏区域展开系统调查后,仍一无所获。难道这又是一桩“悬案”?

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我将目光投向最后一片几乎无法涉足也几无可存的区域——洪水过后河道旁那片狼藉的泥滩。由于洪水刚过的泥滩复杂且有一定危险性,一位村干部原欲与我同住,我以“一个人就够了,我只是不抱希望地去试试,不必都弄得一身泥”婉拒,独自踏入动辄齐膝的淤泥。我沿河跋涉,不时用手铲刮探可能区域,始终未见任何文化遗存。因多次差点滑倒,也险些被铁丝、树枝刮伤,岸上的同志纷纷劝我返回。但“下都下了”,我还是慢慢蹭到了那片泥滩的尽头。

幸运的是,在一块三面环水、不足一平方米的前凸“半岛”——可以说是我最后的立锥之地——后来证实那是当时整个河滩唯一能挖到原生地层的点位,我用手铲刮出了典型石器和动物化石,从而初步确认该地为古人类活动遗址。后面在河边清洗时,我感觉左脚有点不对劲,才发现刚穿第二天的溯溪鞋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不过还好脚没事,这双新鞋后来因为没修而“牺牲”了,但换来了一个水下的远古世界,也开启了此后两年多我们与洪水同行、无数个抗洪抢险的不眠之夜。

与洪水同行的日与夜

2021年11月20日,团队在川西高原完成连续七个月的皮洛遗址发掘后未做休整,直赴资阳,一边调查一边启动濛溪河遗址的抢救性发掘。12月,前期勘探展开。遗址直面河道,初期除确认为旧石器地点外,其内涵与价值一无所知,也缺乏应对水边发掘的专业设施。我们在淤泥中艰难作业,但除鸟木和零星石器和化石外几无收获,工作价值与难度严重失衡。

河边湿冷的空气、淤泥中腐败的味道、冬雨引发的河道涨水与剖面坍塌、高原长期工作积累的疲惫、疫情下工作的焦虑……这一切如乌云压顶。如何破局呢?辗转反侧间,我“梦”到一个想法:既然连脆弱的鸟木都能保存下来,那些微体有机遗存是否亦有幸存,蕴含的整体信息是否也远超常规遗址呢?我们立即暂停发掘,紧急引入植物考古等多学科手段。浮选结果显示大量植物种子与零星人工遗物,首次揭示出遗址非凡的保存潜力与埋藏的复杂性。这个突破振奋了团队信心,我们准备在春节后大干一场——却未料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022年春季,降雨较往年频繁。自2月至5月遗址被迫停耕,我们陷入“下雨即淹、清淤复淹”的循环,平均每5~



濛溪河遗址远景



田野工作照

7天一次。尽管其间偶有惊喜——如木器与遗物较丰富层位的发现——但整整三个月,我们几乎在“抗洪+清淤+再抗洪”中疲于奔命,身上也总是泥泞的。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有趣的小插曲。

按照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的建议,我的同事谭培阳负责大剖面的清理与首批测年及环境样品提取。这本是一周可完成的工作,却因天气恶劣循环拖了三个月。其间我其实考虑到因陋就简,结合实际情况提取一套没那么规范的样品先检测,但“完美主义”的他好几次都兴奋地告诉我,“我这两天再加会儿班,看天气再晴一天就差不多了”。结果晴天却总是没有如期而至,反而总是会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直到5月份阴雨不断,汛将至错失时机。再例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前来关心督导,晴空之下,竟亲历濛溪河二十分钟内水位猛涨一米,探方全面被淹的无奈局面,而这一切仅因前夜一场小雨。周院长归去后协助说明了工作的特殊难度,促使我们决心跳出被动抢险的局面,重新审视遗址的复杂性,也更深刻认识到濛溪河的潜在价值,以及治水与配套建设的紧迫性。

面对这个复杂局面,2022年,时任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七赴濛溪河遗址现场协调指导,被我们戏称为“王诸葛擒孟获”——而他最终“擒住”的是遗址抢救性发掘和保护的大局。资阳市、县、乡三级于2022年12月完成首阶段场地整治与河道清理,2023年上半年陆续建成临时挡水坝与工作用房,使遗址初步具备科学发掘条件。

然而,“伟大”的发现背后是更为艰巨的“伟大”历程。后来每逢降雨预报,各级领导与考古队便彻夜难眠。2023年4月21日与7月28日前后两次大洪水,其间更有数十次小型水患,多方力量连夜抢险,让我们彻底意识到遗址的难度仍被严重低估。4月底,尽管近十个小时奋战,临时堤坝管涌无法遏制,探方再度淹没。清淤时我们苦中作乐,提起涌入探方的鲜鱼烹制了好几顿酸菜鱼、火锅鱼,可笑声背后是深深的无力。

重振士气后,县里加固堤坝,基本解决管涌。然而7月末的洪水远超历史纪录,洪水翻坝,将遗址区彻底吞没,与濛溪河一起化为一片令人绝望的汪洋。水退之后的满目疮痍,让所有人大相顾无言,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濛溪河的工作难度,反衬出其价值之重,既反映了远古濛溪河人在河边生存繁衍与洪水同行的岁月,也映照出当代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自觉与守土之责。

2023年10月,发掘重启;2024年7月,外围大坝初具规模,9月实现围合。我们终于能够高枕无忧,睡个安稳觉——与洪水同行的日子,一去不返。

水下封存六万年的远古世界

当治水的困境逐渐缓解,濛溪河遗址的真实面貌,才能如剥茧抽丝般,缓缓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座被淤泥与河水封存了数万年的“时间胶囊”,其遗物之丰富、信息之全面、价值之突出,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梦想。

动辄万年的沧海桑田之下,脆弱的有机质信息很难保存下来,往往只有最坚韧粗粝的石头能历经万年而不朽。与通常只出土石器的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不同,濛溪河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罕见的、能够窥见远古人类鲜活生活图景的窗口。截至目前,遗址已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是史前极为罕见的“百科全书”式遗址,系统保留了远古人类从生产、生活到精神探索的全要素的信息。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庞大,更是质量的突破。

我们找到了骨器、木器等在一般旧石器遗址中极难保存的有机质工具,与用特殊的硅化木制作的石器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工具制作体系,突破了以往对东亚早期人类技术能力的简单认识。我们发现了许多百年大树,其年轮仍清晰可辨,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苍莽的原始森林。我们发掘了数量惊人、种类丰富的植物种子,它们静静地躺在地层中,仿佛仍在等待几万年前的春天;大量的用火迹象,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砍砸痕迹,让我们得以想象远古先民围火而坐、分享交流的场景。石器、骨器等各类遗物上的刻划线条,更像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密码”,蕴含着远古的智慧与思考。

这些发现的背后,是团队日复一日地攻坚克难与开拓创新。面对如此珍贵且脆弱的遗存,传统的“手铲释天书”仍然重要,但已远远不够。我们深知,濛溪河的每一捧泥土都可能蕴含着海量信息。为此,在发掘中,我们越来越细致,用手铲、竹签,甚至手术刀,在泥泞中小心翼翼地剥离历史。我们高密度采样,所有土全部收集浮选,力求不遗漏任何微观信息。

为了读懂这本“百科全书”,我们汇集国内外年代学、埋藏学、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等领域的“最强大脑”,组成多学科攻坚团队。通过头脑风暴,我们不断发现新问题,并据此动态调整工作方法,最终以一套极致精细的工作体系,逐渐揭开这个水下封存六万年的远古世界。

脚步不停 探索不止

世界级的发现总是与世界级的难度相伴而生,濛溪河遗址便是如此——其年代、环境与文化面貌等相关研究基础几乎一片空白,一切工作都需奠基于此。濛溪河的发掘,正是一个不断突破既有认知、开拓新学术边疆的过程。

基于濛溪河遗址工作中的启发,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得以窥见一个更具突破性的史前社会图景——一个广泛分布于沱江、涪江流域,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濛溪河文化类型”遗址群逐渐浮出水面。这标志着我们的工作从对一个孤立遗址的解读,迈向了对一个区域性古代文化及宏大命题的探索。

回望来路,脚步不停。2021年,团队在完成皮洛遗址长达7个月的高原发掘后,未做停歇便转战资阳,最终揭开了濛溪河这个“时空胶囊”的大幕。2022年5月,刚经历与洪水搏斗三个月的疲惫,团队又无缝转战遂宁,在主动调查中发现了正遭受严重破坏的桃花河遗址,也成功挽救了这片若晚一个月发现便将荡然无存的珍贵遗址,为我国旧石器考古增添了又一个具有世界性突破意义的重要节点。

这一切的起点,是村民拨通的那一条市长热线,将我们引向那片不平凡的泥滩;是上百万日夜与洪水的抗争,为我们赢得了揭示远古秘密的宝贵时间与经验。而最终叩开“水下远古世界”大门的,也是开启目前考古重大突破迭出的“黄金时代”的,是广大考古人的执着坚守,社会公众的守望相助与各级政府的勇于担当,是新时代下对脚下大地共同的历史敬畏与不懈的探索追求。(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十大考古领队说

文明探源之西北调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黄河、长江中下游很多地区的早期文明化进程和模式日益清晰,而黄河上游的相关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文明探源的很多重要问题尚未触及。有鉴于此,201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排李新伟老师带领我赴甘肃开展考古调查。我们从北京出发,在三门峡作短暂停留,然后一路经西安、宝鸡,翻越陇山后进入甘肃。本次考古调查的目的便是挑选合适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探讨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及诸多深层次问题,填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在西北地区的空白。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约5000~3800年,处于文明探源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次调查的重点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进入甘肃后,一路沿渭河溯源而上,后翻越岷山,进入洮河流域,沿途观察地形地貌,踏查各类遗址,其中不乏大地湾遗址、马家窑遗址、齐家坪遗址、寺洼遗址等众多教科书上的经典遗址,收获颇丰。我们挑选了不同区域的几处遗址作为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分别瞄准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不同学术目标。

马家窑文化之转战寺洼山

2014年夏,我们选定在马家窑遗址开展发掘,瞄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目标。9月,赴临洮开启马家窑遗址发掘之旅,首次发掘持续约两个半月,地点选在遗址南部面向巴马峪沟的几处台地,清理出数座马家窑文化房址和大量层状堆积。2015年至2017年,我们又持续开展3次发掘,分别选在遗址南部更高处的瓦家坪台地和低处的巴郎坪台地。其中,瓦家坪台地清理出诸多齐家文化遗存,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壕沟的一段;巴郎坪台地则发现了丰富的马家窑文化层状堆积,在底部还清理出大批马家窑文化重要遗迹。上述工作取得重要收获,更新了学界对马家窑遗址的认识,但与最初寻找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目标仍有差距。项目组研判后达成共识,暂停马家窑遗址考古发掘,转向南部10千米处的寺洼遗址,继续寻找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线索。寺洼遗址早年被称为寺洼山遗址,安特生、夏鼐等前辈学者都在此做过重要工作。遗址位于洮河北出西秦岭的山口外,西面背靠九龙山,东向面向洮河,坐拥广阔且平坦的山前黄土台地,地理位置绝佳。遗址保存较好,地面可见丰富的陶片,断面见有清晰的各类遗迹,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相较于马家窑遗址,寺洼遗址面积更大、内涵更丰富、保存更好、潜力更大,更有可能在此找到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或者中心性聚落。

破局困境之大遗址难题

寺洼遗址是个大型遗址,不仅体现在其面积巨大,已知超过2平方千米(最新线索显示其面积可能更大);还体现在遗址内涵丰富,据现有线索,寺洼遗址延续数千年,存在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历史时期遗存。寺洼遗址虽有百年的发现历史,但不同时期遗存的准确分布范围和各自中心区域其实并不明晰。在这样一个面积巨大、不同时期遗存交错分布的遗址,如何找准位置开展工作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项目组反复研读了前辈学者发表的资料,还在马家窑遗址发掘期间对寺洼遗址开展多次调查和钻探。2018年,项目组开启寺洼遗址新的发掘,地点选在沟两侧两处台地上,其中沟西侧地点目标直指寺洼文化墓地,沟东侧地点则瞄准马家窑文化聚落。正式发掘开始后,沟西侧地点进展顺利,很快找到了寺洼文化的墓葬和墓地。沟东侧地点则进展缓慢,除发现一些马家窑文化灰坑和少量房址外,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关键线索依然不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发掘结束。从2014年开始到2019年,我们已在两处文化命名地遗址开展6次发掘,虽然每次发掘都扎实且有收获,但寻找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目标却迟迟未有重要突破,甚至在潜力巨大的寺洼遗址也陷入胶着状态,项目组有些沮丧。现状的“骨感”让项目组开始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在这一区域寻找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为此,我们在申请2020年度发掘时,准备再做一年便暂停发掘,另寻别的突破。

转机出现之半山聚落

2020年度,我们在沟西侧扩大了发掘范围,沟东侧则新选了一处地点,钻探显示这里有早期陶窑,项目组准备丰富一下马家窑文化的遗迹类型,然后鸣金收兵。转机出现在发掘后期,首先是沟东侧新选地点,清理出保存较好的陶窑,内部堆积中出土较多陶片,其中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陶片相当醒目,意味着这座陶窑极可能是半山类型陶窑。这是一个明显的进展,不仅因为7年来,马家窑遗址和寺洼遗址极少发现半山类型遗存,更因即便放眼全国,半山类型遗存的主要还是墓葬,陶窑极少,一座陶窑的出现,意味着可能还有更丰富的半山类型遗存。果不其然,好消息同时出现在沟西侧发掘区,在寺洼墓地最底部层位下,发现几处打破生土的方形遗迹,清理至底时,见有中心柱,一下豁然开朗,房子!顺藤摸瓜找到门道,梳理房址出土遗物,发现有明确的半山类型陶片且无更晚遗物,极可能是半山房子!与此同时,沟东侧新发掘的陶窑附近也清理出一座颇具规模的房址,与此前发现的马家窑类型房址明显不同,其内部堆积中也发现了半山类型陶片且无更晚遗物,意味着这也可能是一座半山类型房址。我们加速整理了所有出土遗物,在一些灰坑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至此,我们在寺洼遗址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聚落的重要线索,这是继严文明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兰州青岗岔遗址发现少量半山类型非墓葬遗存后,再次发现半山类型的房址、灰坑和陶窑,无疑是重要且具有突破性的发现。项目组初步判断,寺洼遗址可能存在一处半山类型的聚落,足以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

重要突破之三重围堰

2020年发现的半山类型聚落的线索让大家重拾信心。2021年至2022年,项目组重点扩大了沟西侧发掘区的范围,清理出更多马家窑文化房址,有些房址的地面上出土了明确的半山类型陶器,更加夯实了这些房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同时,我们还发现了更多半山类型的灰坑、陶窑,另有房址内葬人的现象,极大丰富了半山类型聚落的内容。在此之外,多处发掘区还发现了丰富的马家窑类型的遗存,包括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新的发现让人高兴,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如聚落形态不明晰,尤其缺乏整体性认识。因此,下一步的目标便是寻找其他聚落要素,特别是事关整体布局的大线索,厘清其聚落形态。要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钻探,只是新近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房址缺少坚硬

活动面,不易辨认。加之,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存上又多有晚期遗存干扰,导致遗址钻探难度很大,不易突破。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事彭小军建议在自然断面上找找线索。一想也是,毕竟断面上的遗迹比钻探看得清晰,遂下决心

把遗址上的自然断面刮开。当然,断面遗迹只是切面,要了解更多线索还得结合钻探。牛世山老师近年在殷墟的钻探卓有成效,于是多次请牛老师支援,推荐有经验的探工帮忙。双管齐下,终于有了收获。2023年春,项目组在沟西侧清理断面时,发现4处位置相邻且形制相当的大型沟状遗迹,均叠压在最底部文化层下,打破生土。我们随即沿断面做了小规模钻探,确认沟状遗迹向北延伸。2023年秋至2024年春,项目组组织探工对其重点钻探,并于2024年夏进行解剖发掘,基本确认上述发现为三重围堰,整体接近南北—东西方向,平行分布,近直角转弯,形制和布局相当规整。现存部分东西长约613、南北宽约440米,内侧复原面积约30万平方米,应是规划和测量后修建的大型工程。从年代、形制布局、内部堆积和出土遗物看,三者应同时存在和使用过,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至半山类型时期尚未填满,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多重直角转弯、长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堰。其三重直角转弯的特征,为后世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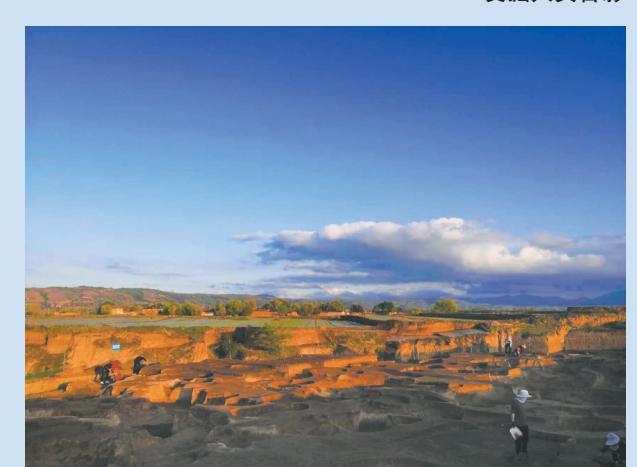
新的百年之未来工作

寺洼遗址作为寺洼文化命名地,从安特生发现至今已101年了,从夏鼐抗战期间的发掘算起,也整整80年了。面对这样一处面积巨大、内涵丰富且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性大遗址,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沿着前辈的足迹走下去。现在,我们对遗址的整体框架有了突破性认识,但对寺洼遗址来说,这更像是工作的开端。我们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又发现了更多线索,更重要的工作应当在未来。首先,我们需要继续深入认识三重围堰本身,比如三重围堰的东部边界、围堰通道和相关设施、三重围堰各自的功能及相互关系等。其次,需要把围堰内侧的聚落内容搞清楚,厘清其功能和布局。目前三重围堰内侧虽在不同区域发现了制陶、石器加工等手工业生产的线索,但认识还相对有限,其准确内涵和全面布局尚待更多工作才能解决。第三,三重围堰外侧,尤其是西侧和南侧还有大量空间,并与马家窑文化疑似道路、夯土的重要线索。如果三重围堰内侧更多与手工业生产有关,那么其外侧相应还有更重要的内容,比如大型或高等级建筑、日常居住区、马家窑文化墓地、其他生产生活设施等。第四,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延续时间较长,从马家窑类型时期延续到半山类型时期。在后续工作中,需注意厘清不同时期聚落形态的面貌及其演变过程。第五,马家窑文化之外,寺洼遗址还发现了丰富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存,这些工作也应逐步开展起来,力争有所突破,尤其是已有重要线索的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聚落。最后,寺洼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性,寺洼遗址的诸多内容更是探讨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未来,我们应继续将遗址置于国际视野下,探讨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问题。总之,寺洼遗址是西北地区一处罕见的大遗址,不光有着百年的学术史,还有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处学术富矿。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有责任把工作继续做好,让其成为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性大遗址,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遗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掘人员合影



寺洼遗址及周边地貌

寺洼山发掘记

郭志委